

主编：祁念曾 魏全瑞



王秦系儿女在深圳

王秦才 题



祁念曾 魏全瑞
PDG

万水千山总是情

——记深圳市委驻深单位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孙仲元

□ 阮仕林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四点，深圳机场。

行人步履匆匆，有的已登上了飞机的舷梯，此时此刻，深圳市委驻深工委副书记、深圳市委驻深工委对口帮扶贵州织金代表团副团长孙仲元却是步履沉重，心潮翻滚，是飞往古城西安，让垂危的老父亲看儿子最后一眼？还是飞往云贵高原，向高寒山区的贫困群众奉献一片爱心？

就在飞机航梯即将收回的刹那间，他毅然选择了后者……

上 篇：求 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

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时期，孙仲元出生在陕西骊山脚下风景秀丽的临潼。它以著名的华清池而闻名于世。三、四十年代，临潼因是西安通往革命圣地延安的交通要道，大批的爱国学生、进步人士纷纷

从这里投奔延安,国民党在这里布下了许多特务分子,敌情十分复杂。

自孙仲元记事起,他就觉得父亲孙巽山是一个十分神秘的人,为什么经常有人在家里三更半夜出入?为什么父亲对客人讲话时总是避开家里人?一直到全国解放后,已经上学读书的他才知道,父亲原是地下党员,参加过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他家就是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接头点。护送过李先念、汪锋、陈少敏等中央领导和大批进步学生到延安。

孙仲元对父亲产生了深深的崇敬之情!

天资聪明加父亲的教诲,使孙仲元学习成绩一直优秀。一九五九年,他17岁就考入了西北政法学院。本来他能如期毕业的,可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也同样受到饥饿的威胁。因此,学校放长假让学生各自回家,自谋生路,等经济形势好转了再通知返校。

农村的学生回去可以种地糊口,而城里的学生怎么办呢?孙仲元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在《陕西日报》社找到一份做记者、编辑的工作。虽不属正式编制,却分到政教部,和老记者们一同出去采访、编报。

一年后,学校通知学生返校,但孙仲元没料到,临近毕业检查身体时,发现肺部有问题,必须休学。其实,这是因营养不良引起的病,只要加强营养打几针青链霉素就很快能治好。但在那时,这么简单的医疗也难以办到,他只好休学养病,之后,加入下一级毕业班一同分配。按他的心愿,是想到北京工作;凭他的成绩,分到北京也没问题,就因为休学,他的愿望化成了泡影。他又向学校要求到新疆、西藏等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学校考虑到上届分配到湖南的名额不够,于是,他背起铺盖,第一次走出陕西,孤身来到湖南。

他又没料到,学校因没有和湖南有关方面联系好,湖南省人事厅不接收,让他返回陕西。而西北政法学院让他本人和湖南人事厅再协商。他只好住进招待所,在孤独、沮丧之中等待一个多月,好不容易随复员军人一块分配到湖南省商业厅。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凡分配到

三秦儿女在深圳

单位的大中专学生，必须到基层劳动锻炼一年。他又卷起铺盖来到商业厅下属的一个五金交电公司仓库。

远离家乡的孤独，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一个踌躇满志的大学生感到失望、苦恼和悲观。可是，每当他看到工人们汗流浹背任劳任怨时，他心里的委屈便顿时消失，为什么工人们能吃苦受累而自己不行呢？受了高等教育决不等于精神贵族，从小受到父亲谆谆教诲的孙仲元想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的话：“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由劳动而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

孙仲元很快地和工人打成了一片。那时，机械化程度很低，他拉板车，扛箱子，什么活重干什么，越是艰苦越向前。工人见他如此卖力，都非常喜欢他。一到下班，他就组织工人们学习，搞文化娱乐活动，带领工人修建了篮球场。还把每月发的奖金都用来买书让职工看，由于他表现好，商业厅批准他提前转正，调他到各科室去锻炼。

就在孙仲元雄心勃勃地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湖南的派性武斗异常凶猛，大街上枪战频繁，老太太也都戴上红袖章，背起了枪杆子，很多老同志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造反派肆无忌惮地冲进省委大院……

革命革命，到底是谁革谁的命？孙仲元疑惑了，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运用自己极具哲学思辨的头脑在思考着社会问题。不料，他那“反动思想”被人揭发，一夜之间，他成了保皇派，陪人游街，批斗。

孙仲元平时人缘好，每当挨批时，台下的工人就有意保护他，高声叫喊：

“孙仲元是受了××的思想影响，他的本质是好的，不要打他……”

也许是善有善报吧！孙仲元在文革陪斗中免受了许多皮肉之苦。

一九六九年，湖南省成立革委会，把上万名干部集中起来，组成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学习，表现好的，放回原单位，不好的，下放到

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孙仲元也是学习班其中的一员。

一九七一年八月，已成为财贸大队政工组宣传通讯干事的孙仲元突然接到一项新的使命——他和10多位同志一起被派往韶山。韶山是革命圣地，那时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前往瞻仰。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央号召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当时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华国锋同志指令，抽派干部恢复和加强已停办数年的韶山党校，把已成为特区的韶山作为湖南省干部重要培训基地，准备分期分批轮训全省各级干部。带着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孙仲元来到了韶山党校，从事宣传通讯和教学工作。

就象当年的延安抗大一样，韶山党校恢复初期，一律实行军事化管理，生活也很艰苦。工作人员和学员住的都是干打垒宿舍，一个宽而又简陋的礼堂兼饭堂，没有桌凳，双膝就是课桌。整队上课，席地就餐。一日三餐都是煮包菜、盐菜汤和一份大米饭。学习之余，就是种粮食、种菜。每逢一期学习班结束，工作人员才能乘座学校唯一的一辆大卡车返回长沙休息两天。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批判林彪的“天才”论。学校在“青年后备干部培训班”开设哲学课，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三篇文章，并安排孙仲元授课。当时没有教材，没有参考资料，新华书店除红宝书外买不到别的书。这是个短期培训班，不可能把在学校系统学习的那一套照搬照抄；还要紧密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学员来自社会各阶层，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一道道难题摆在孙仲元面前。但他心情十分激动，毕竟是毕业六年才第一次接触专业啊！孙仲元回到家中翻出了搁置多年、文革武斗中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教科书，在长沙四处登门请教，到学员中多次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没有充足的时间，只有一课一课地准备讲稿，常常是熬一个通宵，擦把脸，就进了课堂。

那时为了节约电，晚上不准开灯。他就点煤油灯，大热天还要不

时扑打蚊虫。当他第一次走上讲台,面对比他小不了几岁的学员们那几百双渴望、鼓励的眼睛,他平静下来,把深奥的哲学理论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清晰亮丽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用三个小时的时间讲完了第一节课《为什么要学哲学》。从学员们喜悦的表情、讲课中认真记录和阵阵的掌声中,他知道自己成功了。第一次讲课的成功引发了学员们对哲学的极大兴趣。很快,学员们和他成了朋友。课余时间,林荫道上,不时可见他们热烈交谈的身影。

这些被文革“停课闹革命”耽误了的青年学员,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他们与孙仲元的关系亲密无间,平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亲如兄弟,临结业前,他们“偷”出了孙仲元还未来得及整理的潦草凌乱的讲稿,分头精心整理并打印成册,留给了自己,也作为“礼物”送给了孙老师。后来,这批学员大都分配在省直机关和各地党政部门。一九七五年初,当孙仲元离开湖南调回陕西之际,不少学员闻讯赶到长沙,为他们所崇敬的、曾朝夕相处数月的孙老师送行。

在韶山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在那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地方,特殊的经历,无论是酸甜苦辣都使孙仲元终生难忘。

在别人眼里,孙仲元是一个政治觉悟高,理论知识深的人。可是,有谁知道他内心的深处却在流血?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那清正廉洁、乐施好善的父亲孙巽山不明不白地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受到残酷迫害和折磨,孙仲元想见父亲一面的愿望都难以实现。

一九七九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在一大批老干部身上得到落实,遭受了十多年残酷迫害和折磨的孙巽山先生也得到平反昭雪。当组织上问他有何要求时,老人只提了一条:能否把他的儿子调到他的身边。

调回陕西后的孙仲元被分配到陕西广播电台任编辑、记者。又担

任两年电台驻安康记者站站长,之后,调回电台总编室工作。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一旦砸碎了精神的枷锁、思想的铁链,孙仲元以无比的激情和先行者的姿态投入到各种社会变革的活动中去。他和电台几个同事一起商量,要创办一份广播电视节目报,好不容易征得了领导的同意,几个人说干就干,经过艰苦的工作,第一份报纸印出来了。第二天,他在电台门口摆了一张长桌,没想到买报纸的人排起长队,而且对这份报纸的反映非常热烈,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广播电视报为周报,每到周五晚上,他们都要忙到通宵。

一个月不到,报纸的发行量逐渐增加,到1984年孙仲元离开陕西的时候,《陕西广播电视报》的发行量已达到20万份。

“生活就是变革,完美就是不断变化”。一切美好事物都由创新而来。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目标确定之后,具有超前思想的孙仲元马上意识到,计划经济就要被市场经济所取代。那么,广告在市场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他立即向电台领导建议:电台设立一个广告部。这本来是一件极具发展前景的事业,但办得却是那样的艰难。广告部成立后,而企业的反响并不强烈,那时还是计划经济,人们的广告意识普遍淡薄,一些企业领导难以接受,认为他们的产品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根本不用做宣传。

孙仲元不知跑了多少家企业,费了多少口舌,总算还有超前意识的企业领导同意宣传他们的产品。他精心策划,精心制作,用生动优美的广告词给产品锦上添花,经他制作的产品广告,效果果然不同凡响。而后,孙仲元又独出心裁,把广告内容制作为几分钟的广播剧,新颖独特,妙语连珠,使人们在通过广告了解产品的同时,也得到一种美的享受。这时,一些企业领导才如梦初醒:原来,好酒也要勤吆喝!于是纷纷参与广告制作,电台的广告时间也逐渐增加,既为电台增加了收入,又使节目丰富多彩。

当时,全国只有五、六家电台制作广告,作为第一届中国广告协会

会员、理事，孙仲元结识了全国很多广告业的朋友，他和几家电台热心广告事业的同仁，经常探讨广告工作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探讨广告事业的普及和发展。在孙仲元等人的带动下，广告浪潮逐渐波及全国，各地的电台也纷纷效仿。这期间，孙仲元和他的伙伴们，北上南下，东联西进，足迹踏遍全国。广播广告如同一团火球越滚越旺，很快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广播广告网络。完全可以说，孙仲元为传播产品信息，为推动陕西乃至全国的广告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九八〇年，孙仲元到广州出差，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音像公司——广州太平洋音像公司，象磁铁一般吸引住了他，他决心在西安办起全省第一家音像公司，一回到陕西就写了一份可行性报告递交给广播电视厅。可是，到领导对这一事业的认识、重视并着手准备筹办的时候已经是四年以后的事情。这时，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音像公司已经多得数不清了。

思想活跃的人总是不甘寂寞。音像公司没有搞成，他和电台、广播电视厅的七个同仁向领导建议：搞个经济广播电台，以播经济和新闻为主，并且自负盈亏。他们将这个方案呈报给当时的孙达人副省长，孙副省长非常支持。但是，方案报给电台、广播电视厅后，又是长时间没有音讯。时隔两年之后，全国第一家经济广播电台在广东诞生，而且模式和孙仲元他们当初设想的完全一样。

十多年后，孙仲元在回想起他参加工作几十年的生涯时，曾如此感慨地说：“在湖南工作了十年，回陕西又工作了十年。前十年的往事不堪回首，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啊！在陕西工作的十年间，虽然做了许多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总觉得每做一件事情，总是那样的艰难……”

一九八四年，已担任广播电视厅办公室主任，并即将在职务上再次迁升的孙仲元，费了一番周折，告别了哺育他的三秦故土和年迈的父母，应深圳市委的招聘来到了深圳经济特区。

中 篇:奋 斗

奋斗乃万物之父。

——陶行知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深圳,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一片荒芜之中崛起。

不甘平庸的孙仲元来到深圳后,本想下海到企业工作,因当时的大多数企业是副处级以下的企业,而孙仲元却是正处级,因而一时很难安排。孙仲元主动找到人事局领导,说自己是为了特区建设闯深圳的,不是为了当官,不在乎级别不级别,人事局只好把他安排到鹏基工业发展服务公司(当时为副处级企业)。当时的公司老总是知名企业家,又是陕西老乡,特意安排他任公司政治部副主任。孙仲元说,要下就下彻底,主动要求去公司的下属企业。在下属内联企业和合资企业两个地方虽干了一年多的时间,但他却尽全力熟悉新的事业、新的环境,使自己很快适应而且重新摸索出了人生道路上新的起点。

一九八六年,深圳市委成立经济工作部,一纸调令,孙仲元又进了市委机关任经济工作部宣传教育处处长。从此,开始了他专职从事党的工作的生涯,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成为特区长期从事党的工作的为数不多的干部之一。

一九八八年,经济工作部撤销,深圳市委成立了驻深单位工作委员会,孙仲元任办公室主任,一九九〇年,升任副书记。在此期间,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结识了许多企业领导,以至于对他几年之后所干的那番千秋大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有许多内地人认为,深圳只是重视经济,而不重视党建工作,这是

三秦儿女在深圳

大错特错的。孙仲元认为,特区的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是同步进行发展的,深圳市委不但非常重视党的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而且根据经济工作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实践中不断地改进和完善,闯出了一条新路和独特的模式、体系。十多年来,他接待了无数批全国各地来深考察团,每次,他不仅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还专门向考察团汇报深圳党的建设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有一次,他去宾馆看望几位从老区来的老干部,没有想到,几个老干部在深圳转了一圈之后,回到宾馆抱头痛哭,孙仲元感到莫名其妙,详细过问,才得知原由,原来,几位老干部看到街上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广告,舞厅里传出令他们难以接受的现代音乐,男男女女拥抱着翩翩起舞,浓妆艳抹的女服务员礼貌地对他们嫣然一笑,使老革命们魂飞胆破,天啦,社会主义被他们糟蹋成这样了!以往在电影里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灯红酒绿的奢侈生活,如今活生生的展现在他们面前,怎能不使他们吃惊?孙仲元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这是现代社会文明的象征,邓小平同志讲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请你们放心,在深圳,社会主义的大旗永远也不会倒。”

特区建立初期,深圳市委就把在外资企业内部建立党组织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当时,不仅外商十分担心,他们认为建立党组织就是要搞阶级斗争,因而产生抵触情绪;我们有不少同志对此也心怀顾虑。那时,有的企业内部存在着“地下党员”、“口袋党员”的现象。一是党员不敢暴露身份,一旦暴露就会有被炒的危险,二是有的内地来的党员,他们认为出来打工为挣钱,把党员关系装在口袋里几年没人知道。这些情况引起了深圳市委的高度重视,市委要求,在每一个外资企业内部,必须建立党组织。

孙仲元认为,外商投资企业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实体,它有其本身

的特殊性,突出表现在:从企业性质看属于国家资本主义,从经济成份看,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公有或完全公有,而是部分或全部为外商所有,存在雇用劳动甚至是剥削;从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看,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企业的人事,财务,生产经营权不同程度地掌握在外商或其代理人手中;从用工制度看,企业普遍实行合同制等等。这些特殊性决定了外商投资企业党组织的建立、党组织的工作环境,党组织的活动方式,以及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程度不同地区别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因此,要在外商企业内部建立党组织,就不能照搬全民所有制的做法,必须从外商投资企业的实际出发。

孙仲元不知走访了多少家企业,他吃过“闭门羹”,坐过“凉板凳”,但他并不气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激励着他克服一切困难,那里有外商企业,那里就有党的组织。

在市委领导的支持下,终于率先在几个大型外商企业内部建立了党组织。但是,由于外商对党的方针政策缺乏全面的认识,党组织的工作难以开展,有的几乎是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况下,孙仲元和同事们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向外商举了一个外方企业失败的例子:

有一个外商投资企业在经营严重亏损,濒临倒闭的情况下,只好由中方人员承包管理。外方撤走了全部经理和技术人员,并表示对公司的起死回生不抱任何希望。

实践证明,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四年之后,公司效益成倍增长,销售额近三亿港元。当时的丹麦总经理莫斯卡先生在回顾自己失败的原因时说:“看来,在中国离开了共产党将会一事无成。”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莫斯卡先生失败呢?

公司的内部管理可以说是下了力气的,他们不但有训练有素的管理队伍,而且还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对违反厂方规定的员工处罚

不留情，一年之内，330 多人的公司，200 多人被炒掉，他们认为，员工进厂就是为了赚钱，你付出了劳动，我就给你报酬，我们用报酬买来了你的劳动，你就理所当然地要听我们的摆布，这样，本来是“国家主人”的员工，成了纯粹的“打工者”。管理人员和员工的矛盾，就此发生了，员工的消极情绪渐渐滋长了他们的“打工”意识，认为干了今天没明天，企业的好坏和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同时，对立情绪日益加深，厂内曾一度出现“岂容国土再遭践踏”的标语，还出现过罢工事件。

由此看来，单凭一个“严”字是管理不好企业的。他们的种种制度都管在 8 小时以内，至于 8 小时之外的时间从不干预，赌博成风，员工素质下降，终酿成亏损的结局。

孙仲元语重心长地说：“他们根本没有把员工当成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来对待。如果建立了党的组织，我们可以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教育他们爱厂如家，爱岗敬业，企业遇到困难，党员一马当先，企业党组织解决不了的问题，有上级机关来处理解决，你们想想，这有什么不好吗？”

这一番话说的有情有理，入木三分，有的听得沉思不语，有的连连点头。

孙仲元在和外资企业的老总们沟通感情的基础上，和他们倾心交谈，交朋结友，市里给他们派去了年富力强，政治素质高的党员出任党委书记兼副经理，几年来，外资企业的党组织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个外商对孙仲元说：

“用我们的管理方式，加上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的企业成功的必经之路。”

在经济工作部的两年中，孙仲元走访了不少企业，对外商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更深的研究，在他的获奖论文《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几个问题》中，提出了外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

是：宣传党的政策，稳定职工思想，提高职工技能，沟通劳资关系；难点是：思想认识跟不上，政工力量薄弱，人员结构复杂，管理体制特殊；基本方法是：说服教育法，关心爱护法，开展活动法，培训技能法，沟通思想法等新的观点，并赋予“企业文化”以新的内容，提出了“社会主义企业文化”这一新概念。

一九八八年，经济工作部撤销。深圳市委为了加强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及广东省驻深单位的党建工作，成立了市委驻深单位工作委员会。孙仲元改任工委办公室主任，一九九〇年升任工委副书记。职务的升迁意味着责任的加重，孙仲元以更加务实的精神投入新岗位的各项工 作，无怨无悔地一干就是八年。

丘吉尔说过：“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总得钉在行动或思想的十字架上，或思考，或行动。”孙仲元对此有着深刻的领悟。他就是那种思考中行动，行动中思考的人。

驻深单位是深圳市建设与发展的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在深圳的经济总量与规模上，三分天下有其一。如此重要的方面军，内部各单位之间却是分散的，因为各驻深单位的人、财、物受制于各自的主管上级。驻深工委仅以党组织的属地化管理原则实施对驻深单位的管理，实际工作以协调服务为主，务虚多于务实，面对人员流动多、行业结构复杂、规模大小不等的数千家驻深单位，建立什么样的党建工作管理体制，确立什么样的工作方式，采取什么措施来有效地实施驻深工委的管理职能，孙仲元和他的同事们煞费苦心，凭着一股韧劲进行了多年的探索，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归口分级管理的体制。

驻深单位数千家，产权关系、行政人事关系互不隶属，若都划归驻深工委直接管理，以驻深工委少量的编制人员的现状看是无法应付局面的。实行归口分级管理既兼顾了驻深工委履行职能的实际，又充分尊重和依靠了各驻深单位的主管上级，双方的积极性都得到了发挥。

归口到某一中央部委或省市驻深单位的党组织,无论在哪一层哪一级上接受属地化管理,都可及时了解到市委和驻深工委的工作部署。在必要的时候,还可得到驻深工委和有关中央部委党组或省市党委的联合指导。实践证明,归口分级管理体制是适合大多数驻深单位实际的。

管理体制的建立不等于工作成效的自然获得。孙仲元深知,驻深工委的工作要获得驻深单位认同、支持、配合,仅靠归口分级管理体制下的原则要求是难于见效的,必须辅之以高超的工作艺术。为此,孙仲元要求驻深工委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树立搞好协调服务,广交各路朋友的思想,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了解决驻深单位干部的户口、煤气指标、子女就学等诸多实际困难,孙仲元不知托了多少人情,费了多少口舌,奔波于深圳市的有关单位之间,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孙仲元指示驻深工委的有关人员在涉及驻深单位干部出国、赴港的政审、职称评审等问题时,务求优质、高效服务,决不允许收所谓填表费、指标费、办公费。驻深单位有集体活动而邀请到驻深工委时,无论多么辛苦、无论是否节假日,只要是工作需要,孙仲元总是亲自出席或派相关人员参加。由于孙仲元能与驻深单位打成一片,与众多驻深单位的领导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友谊,驻深工委在工作上的号召力无形中得到了加强。市委市政府赋予驻深工委的诸多硬任务如历次的扶贫捐款等所以能圆满完成,无不凝结着孙仲元的心血。在一次捐款动员会上,一些老总们就曾表示:“看在你老孙的面子上,说什么也得完成募捐任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在深圳的逐步形成,一大批新型经济组织也在深圳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新型经济组织中的党建课题也摆在市委的面前。以往的驻深单位多系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等这些无主管上级单位中,如何建立党组织和实施管理一时没

有成规可循。但孙仲元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意识到,企业可以抓大放小,党的组织不能抓大放小。于是,他提出新型经济组织具备成立党组织条件的,只要找到驻深工委,一律接纳。决不让党员游离于党组织的管理之外。还要积极探索相应的管理体制。

孙仲元还兼任驻深纪工委书记,这是一个履行职责不易的职务。孙仲元对此没有丝毫的回避和退缩。他认为,纪检工作同样是党的重点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始终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来进行。执行党纪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该保护的坚决保护,该支持的坚决支持,该查处的坚决查处。

然而,纪检工作毕竟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在驻深单位尤其具有特殊性。各驻深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大多远离主管上级,轮换较快。深圳的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经济活动方式与内地都有不同,在诱惑多、陷阱多的环境里,如何鉴别一个干部是否违规违纪,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该查处的当然要毫不手软。但有时,纪检部门接到的举报信,内容骇人听闻,反映到远离深圳的被举报人的主管上级,兴师动众调查一番是很自然的,即使调查不出结果,也会给被举报人在心理上、工作上造成很大的压力。举报是否失实,是否需要调查,有时是需要纪工委和孙仲元以敢负责任、敢冒风险的精神先行表态的。遇到这种棘手问题,孙仲元以他对政策界限的把握和对驻深单位干部的了解程度经常出面化解一些矛盾和误解,有效地保护了一些干部,使他们能集中精力于经营管理活动中,免受不应有的干扰。

在孙仲元分管的工作领域,驻深单位共青团工作也是值得一书的。如果说驻深党工委的工作难度较大的话,驻深团工委的工作更是如此。为了使驻深团工委的工作跟上全市蓬勃发展的共青团工作步伐,孙仲元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辛劳。针对驻深单位共青团干部思想活跃,各有主见,工作上难以形成整体合力的状况,他采取精心选配团

三秦儿女在深圳

工委领导班子、培养团的领导骨干、召开工作会议、亲自参加重大活动、协调解决经费困难等一系列措施,提高团工委的威信,鼓舞团干部的工作士气,创造了驻深单位共青团工作的良好外部条件,最终促进团工委团结协作工作局面的形成。一九九八年初,团工委在大亚湾召开年度工作会议,孙仲元驱车六十公里亲临会议讲话,不仅从政治方向、工作重点、工作方法方面对驻深单位团干加以指导,而且再一次语重心长地希望全体团干珍惜来之不易的团结协作局面,受到广泛的拥护和好评。这篇讲话稿报送团市委后,反响良好,被刊登于《深圳共青团》专刊上,发行到全市和全国。他还多次被评为“青年之友”。深圳团市委的领导在考核驻深团工委工作时,曾当众讲过一句话:“有孙书记这样实实在在关心支持共青团工作的党政领导,我们对共青团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默默地干了八年的工委副书记,工作部门、岗位、职务都无变化,不少人对他讲,你也该挪动挪动了。对此,孙仲元的心态非常平静,他说:“挪动不挪动,那是组织上的事情,眼看离退休也不远了,回首往事,不因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遗憾;更为在最后一站的20年能在特区工作感到光荣和自豪。还是那句老话,到特区来不是为了当官的,还是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于人民有益的、实在的事情吧!”

下 篇 : 奉 献

奉献乃是生活的真正意义。

——(奥地利)阿德勒

特区建立以来,深圳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其辉煌成就离不开全国的支持。当深圳在完成第一次创业后,又以各种形式来回报全国各

族人民。

一九九五年，深圳市委开展了“特区和老区、山区心连心”活动后，延安、井冈山、萍乡、织金等地处处留下了深圳人的足迹，特区人民向贫困地区奉献了一片片爱心。

同年八月，孙仲元率领一个企业考察团来到了延安。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一踏进革命的圣地，他耳边就响起了这首嘹亮的歌声。延安人民早在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如今，先富裕起来的深圳人理应伸出援助的双手。在考察期间，他踏遍了延安的山山水水，厂矿、学校、农村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热腾腾的油糕，滚烫的酒；黄灿灿的小米，火红的枣，延安人民就象当年款待红军一样迎接来自南方的客人。孙仲元倍受感动。先后两次考察，由深圳市经济合作发展基金出资 850 万元，援助“扶贫造血”项目四个。在百家企业访延安活动中，孙仲元经常奔走在老区与企业之间，精心组织，大力宣传。如今，前往延安考察访问的深圳企业早已不止百家。延安人民永远记住他这位根蔓深圳的“老陕”的“老根情结”。

离开了黄土高坡，又多次踏上了赣西这块红土地。震惊中外的萍浏醴起义，作为辛亥革命的前声，是在这里举起义旗；著名的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和秋收起义的发源地，留下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伟人的足迹。在萍乡 38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英名在册的革命烈士就达 1400 多人。眼前这座古老的煤城，如今已逐渐发展成为江西省重要工业城市。但由于地理条件的制约，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孙仲元和驻深工委的领导带头每人捐款